

黎昕◎主编

# 闽台文化交流 与合作研究

MINTAI WENHUA JIAOLIU  
YU HEZUO YANJIU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黎昕◎主编

# 闽台文化交流 与合作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台文化交流与合作研究 / 黎昕主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68-5549-5

I. ①闽… II. ①黎… III. ①文化交流—研究—福建省、台湾省 ②文化产业—产业合作—研究—福建省、台湾省 IV. ①G127.57 ②G1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1020号

闽台文化交流与合作研究

黎 昕 主编

---

责任编辑 毕 磊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版式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549-5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第一章 闽台文化渊源及其特征           | 1  |
| 第一节 闽台区域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 1  |
| 第二节 闽台密不可分的文化关系          | 5  |
| 第三节 闽台文化的共同特质与共生活力       | 9  |
| 第二章 闽台文化交流合作的底蕴与拓展       | 15 |
| 第一节 闽台文化交流合作发展的历程        | 15 |
| 第二节 闽台文化交流合作的地域特征        | 21 |
| 第三节 闽台文化交流合作的步步提高        | 34 |
| 第三章 闽台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上）       | 43 |
| 第一节 闽台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的历史渊源     | 44 |
| 第二节 当代闽台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交流的发展历程 | 47 |
| 第三节 闽台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交流的影响     | 67 |

|                        |     |
|------------------------|-----|
| 第四章 闽台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下）     | 73  |
| 第一节 闽台宗亲文化交流           | 73  |
| 第二节 闽台民间艺术、民俗文化与基层交流   | 93  |
| 第三节 深化闽台民间文化交流的策略选择    | 109 |
| 第五章 闽台文化对口交流与合作        | 118 |
| 第一节 闽台科技交流与合作          | 118 |
| 第二节 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          | 127 |
| 第三节 闽台出版传媒交流与合作        | 142 |
| 第四节 闽台体育交流与合作          | 146 |
| 第六章 闽台文化产业交流与合作        | 154 |
| 第一节 闽台文化产业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分析   | 155 |
| 第二节 闽台文化产业交流与合作的问题探讨   | 169 |
| 第三节 加强闽台文化产业交流与合作的对策思路 | 178 |
| 第七章 深化和拓展闽台文化交流与合作     | 190 |
| 第一节 深化闽台文化交流合作面临的新形势   | 190 |
| 第二节 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制约性因素  | 197 |
| 第三节 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思考与前瞻  | 202 |
| 主要参考文献                 | 216 |
| 后 记                    | 222 |

## 第一章 闽台文化渊源及其特征

闽台文化交流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这不仅是基于现实和前瞻性的判断，也是基于闽台文化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共同特质。这种渊源和特质具有上千年积淀的基础，表现于文化的方方面面，渗透于两岸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出于何种主观意志的干扰和人为切割，都是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和无法阻断的天然联系。当两岸迎来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闽台历史文化关系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新的生机。

### 第一节 闽台区域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从足够宽广的时空视野来看，闽台区域历史上的发展，有着显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闽台地区的早期开发，从根本上看来，是一部汉民族迁移和汉文化传播、开发东南地区的历史。在中国历史的早期，福建与台湾都属于边鄙之地，在汉族文化到来之前，发展相当缓慢。福建在汉代还被视为“瘴疠之地”；隔海相望的台湾，则一直到宋元仍处于刀耕火耨的原始生产方式。以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比照于被认为同为记载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状况的三国时期的《临海水土志》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台湾少数民族居民社会在这千余年间，没有多少实质的进步，台湾社会的实质进步，与福建一样，都是在汉族移民到来以后。尽管二者的发展不

是同步的，但其前后时差，恰好构成一种开发顺序的时间衔接链。

汉族迁移、开发东南地区，经历了漫长、渐进和波浪起伏的过程，曾经出现三波大的开发浪潮。

第一波出现于秦汉时期，其标志性事实，就是闽越国的强盛。

秦末闽越族首领无诸率众参与推翻秦朝统治的战争，这说明闽越族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并具有了一定实力。汉朝建立后，无诸被封为闽越王。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闽越国国力增长迅速，逐步成为南中国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鼎盛时期的闽越国，“甲卒不下数十万”，其兴旺状态甚至令王室成员联想到他们祖先勾践的辉煌霸业，曾“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sup>①</sup>。这样一个强盛的王国，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东南区域开发的程度。

推动这波开发浪潮的主体力量虽是闽越族，但其物质和精神动力显然都来自中原汉族文化。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农业就进入了牛耕和铁制工具时代，并由此推动了一场以大片开发荒地为主题的农业革命。到战国后期，以华夏为主、夏夷融合的农业开发，已延伸到长江南岸的广大地区。汉封闽越国，为中原农业革命成果在东南地区的推广铺平了道路。南方茂密的原始森林，为矿冶业提供了丰富的燃料，从汉初开始，福建地区铁器的使用就已相当普遍，其在各方面应用的广度和深度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大量考古资料表明，闽越国已有大面积垦田和农耕的能力，稻作农业已成为闽越国的经济基础。这是中原汉族文化传播、影响东南地区，与闽越族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引起的东南区域第一波开发浪潮。

第二波出现于唐宋之间，其标志性事实，是使东南地区在宋朝达到经济文化全盛状态。

闽越国因公然反叛中央朝廷，于公元前 111 年被汉朝所灭。汉武帝对桀骜不驯的闽越族采取“取其民而弃其地”的策略，东南区域的发展一时陷入谷底。三

---

① 班固：《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3 页。



国时期，东吴基于拓展领地、巩固后方的需要，派军经略闽地，增设郡县。两晋间，北方战乱，汉族南移，东南区域历史逐步走出低谷。唐至五代间，多种政治风云际会，进一步促成了东南区域的开发，并奠定了这一区域走向历史新高峰的基础。一是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受命入闽平乱，促进了闽南地区的开发；二是中唐安史之乱后，迁徙东南的汉族农民骤然增多，大片荒滩、湖泊、盐碱地和沿海滩涂被改造成良田；三是唐末、五代时，王潮、王审知入闽，对东南区域展开全面经营，使东南开发向更加综合、全面发展。

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是这波开发浪潮的突出特点；而农业技术创新，则是开发进程的根本动力。两宋时期，福建在围海造田、陂塘建筑、水车灌溉、品种改良、经济作物引种等方面的技术运用，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土地开发程度被生动地描述为：“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以此为基础，东南区域的发展跃上了新的高峰。宋朝福建路“民安土乐业，川原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sup>①</sup>，两百多年间从人口稀少地区一跃而成人口密集乃至过剩地区，制盐、制茶、制瓷、造船、矿冶等手工业全国闻名，银、铜、铅、金、铁、锡等产量居全国前列；商业经济空前发达，元代泉州被称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巨港之一；社会事业极其繁荣，人才辈出，时人感慨：“而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sup>②</sup>两宋福建进士占全国总数近五分之一。总之，当时福建经济社会呈现一种全盛状态，标志着东南区域尤其是福建发展的又一个历史高峰。

第三波出现于明清以后，其标志性事实，就是台湾的开发。

台湾之为东南区域开发的一部分，其实在第二波开发浪潮的初期就已见端倪。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吴国派军“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和隋朝三次派兵入流求。这些事件说明台湾已经进入大陆政权的开发视野，只是限于技术条件，尚未能设治。宋元以后，福建开发已臻完成，其雄厚的经济技术条件及人口过剩所产生的强大辐射力，必然促使开发浪潮涌向作为东南区域表层空间的台湾这块农

① 脱脱：《宋史·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② 陈必复：《南宋群贤小集·端隐吟稿序》（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上海古籍流通处1921年版。



业宝地。开发台湾的主力军，就是过去开发福建的主力军的后裔，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能表明台湾的开发是整个东南开发进程的一部分的了。从明末到近代，大陆移民台湾大体有四次高潮。一是明崇祯年间应郑芝龙之招徕，大批沿海农民入台垦殖；荷兰殖民者也采取鼓励大陆移民政策。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带去大批官兵、家属以及受招徕的农民。三是清朝统一台湾并解除海禁后，入台人口大增。四是 1885 年台湾建省引起的又一次移民高潮。

与这四波移民潮相对应的，是台湾土地开发的一轮轮拓展。汉人到台初期和荷据时期，开发地主要局限于台南附近；郑氏政权时代，开始分别往南、北拓展到高雄、嘉义等地，有些开发点分布到北部的基隆、淡水及台中等地；清朝统一台湾后，开发大军开始大规模向北部推进，原先的开发点也逐步扩大，连成一片，到嘉庆、道光年间，台湾西部及宜兰地区绝大部分已开发完毕；1874 年，沈葆祯受命办理台湾事务，开辟东西通道以促进台湾东部开发，开发区域继续向各高山荒埔延伸。到 19 世纪 90 年代，在农业土地资源的意义上，台湾已完成了全岛开发。

与台湾土地开发相伴随，可以看到一种与前此东南区域开发浪潮惊人相似的另一种进程，那就是地方建置的跟进完善。这个过程可以用学术界常用的一个术语来描述，那就是“内地化”。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台湾农业意义上的土地资源开发基本完成的时候，台湾同样升格为内地的一个省级建置，并有了 4 府（州）17 县（厅）的地方建置格局。如果不是后来各种外来因素的干涉，台湾省建置与内地各省不会有任何差别。因此，立足于足够宽广的时空视野，可以清晰地看到，台湾的开发，是福建开发的继续和延伸，这一连续过程是不能割断的，否则就看不到台湾历史的本质，也理不出台湾历史发展的头绪。对于从福建到台湾，整个东南地区的开发史，当有一个连续的整体观。无论其历史差异性如何，都应该先抓住这个最根本的主线，才能看清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及其内在联系。

## 第二节 闽台密不可分的文化关系

在东南区域第三波开发浪潮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因素,那就是殖民者所带来的西方海洋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激活了东南区域固有的“水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勇于冒险的闽越文化遗风,以及宋元时代阿拉伯文化所带来的经商传统。横亘于两岸之间的台湾海峡,成为东南经济生活的新的重要舞台,并由此锻造出整个区域文化的新品质。如果说,第一、第二波开发浪潮推动了东南地区大陆部分的文化的内地化的话,那么,第三波浪潮则是在继续将这种内地化推向台湾的同时,又推动了整个东南区域文化的本土化。总体来看,从闽越国崛起,到宋代经济社会全盛,再到台湾的开发和建省,呈现出一种以汉族文化传播至东南区域为主线的逐步递进、绵长连贯的历史过程;而汉文化影响下闽越文化的辉煌,宋代东南文化的内地化,以及清代东南文化的本土化,则构成东南区域文化发展的几个内在相连的环节。这几个环节的完成,使东南区域整合为一个相对成形的文化单元——既不能脱离汉文化母体而存在,又保持其内在牵连和独特个性。这就是以台湾海峡为纽带的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

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与闽台开发历史进程相联系。由于该历史进程并非同步完成而是依次推进,闽、台文化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以福建汉族为主体的开发大军,将闽文化带到台湾,在跨海开发中,增强了海洋文化的色彩,这是一个重要区别。此外,台湾在1895年以后经历了比较特别的历史,也使台湾文化具有了更加多元的色彩。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闽、台文化与生俱来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一般被概括为“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关系。

地缘是指闽台地理相近的天然关系。台湾与福建隔海峡相望,海峡宽度在100 ~ 200 公里之间,福建省的平潭岛离台湾新竹只有68海里,是大陆与台湾

之间最近的地方。从东山岛至澎湖列岛之间，有一条浅海带，称为“东山陆架”，只有 40 米左右，最浅的才 10 多米。在远古时期由于冰期的出现，海平面下降，台湾海峡曾露出海面，古人类和动物可以通行。据科学家研究和统计，台湾岛已发现有 64 种兽类源于大陆。

亲缘是指闽台居民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考古资料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台湾许多古人类遗迹与福建相应遗址，无论是生活年代还是文化特征都极其相近相似。福建最早的先住民是闽族和闽越族。汉武帝灭闽越国时，部分闽越人驾船入海，有人推测闽越人从这时候开始进入台湾，成为台湾平埔人和山地少数民族的祖先。三国时《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表明夷洲土著与大陆古越族存在族源关系，这一记叙已被现代 DNA 技术所证明。而台湾的汉族同胞，有 80% 祖籍地在福建，原先台湾人称福建和广东移民为“唐山入”，清朝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载，台湾各地以福建地名命名的有 91 处，皆因移民怀念故土之故。1988 年台湾出版《台湾族谱目录》，收录 200 多个姓氏族谱，多追溯祖先来自大陆中原，如“江夏黄氏”“颍川陈氏”“延陵吴氏”等，这种样式，与福建族谱如出一辙。闽台居民有着共同的祖先，社会学家用“越源汉流”来概括闽台人民悠久的民族源流。

商缘是指闽台自古以来都有着特别密切的经贸关系。早在隋唐以前，闽台就有人员和贸易往来，福建铜铁等金属产品和瓷器输入台湾，提高了当地生产力。宋元时期，台湾在行政上开始归属福建，两岸经贸往来更加紧密。明清两朝，随着福建向台湾移民陡然增多，两地农工产品及生产技术交流急剧增长，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康熙统一台湾，都极大地强化了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日本窃据台湾时期，闽台经贸往来并没有被切断。新中国建立后，两岸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况，但即使是台海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依然是“人不通船通，船不通货通”。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和台湾当局“解禁”，闽台经贸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化和发展，厦门经济特区成为台商进军大陆的第一波“登陆”前沿。30 多年来，台湾一直是福建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之一，是福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法缘是指台湾最早在行政上隶属福建,奠定了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法理基础。三国时代孙权派兵“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是中国政府经略台湾之始。隋炀帝三次派人去流求,表明台湾一直在中国政府视界以内。宋驻军澎湖、元设澎湖巡检司,均隶属福建晋江县。明朝民间跨海开发台湾有成者,都是福建人。郑成功收复台湾,照明朝体制设立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清朝统一台湾后,在明郑旧建置基础上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福建自宋时即有八州军,称“八闽”,继之增设福宁府,称“九闽”,台湾加入后,又称“十闽”。其后直至1885年台湾建省,仍然称作“福建台湾省”。因此,从历史上看,闽、台总是连在一起的,闽台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法缘关系。

文缘是指闽台特殊的文化关系。在“五缘”关系中,与两岸人民生活最密不可分,最能够拉近彼此距离、引起情感共鸣并激发认同感的,就是文缘。文缘内涵丰富,包括语言、社会教化、民间文艺、习俗、信仰等,故又被称为语缘、艺缘、俗缘、神缘。

语言——语言相通是闽台文化密切关系最直接的体现。台湾地区说闽南话的人口占到全台湾人口的80%。闽南话在台湾又被称为“河洛话”,表明其源自中原古汉语。台湾闽南话是漳州话、泉州话、厦门话掺和的产物,它与大陆闽南地区的闽南话虽然有各种口音差别,但互相都能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此外,台湾还有不少人讲客家话、福州话等,也都能与福建人攀上乡亲之谊。

社会教化——台湾的儒学教育,完全是受福建朱子理学的影响。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从福建带走大批文人学士,局势安定之后,就在台湾建圣庙、办学校。清朝统一台湾后,随着地方行政建置的完善,府、县儒学次第设立。由于台湾初辟,文教人才不足,教育官员和教师几乎都从福建引进,福建的朱子理学传统,从此就在台湾生根发芽。闽台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有着强大的共同基础。

民间文艺——台湾传统的民间文艺生活,与福建非常相似。如今在台湾流传的主要剧种有车鼓弄、梨园戏、乱弹、西平戏、高甲戏、傀儡戏、布袋戏、歌仔戏、闽剧等多种,台湾流行的戏剧基本上是福建原籍所流行的家乡戏或地方戏。南音、伬唱、十番、评话等福建地方音乐、曲艺,在台湾也有很广泛的知音。还

有雕刻、彩绘、陶瓷、版画、皮影、漆艺、剪纸、刺绣等民间美术，闽台两岸也有很深的渊源。

风俗习惯——台湾民间的风俗习惯，几乎是闽南、粤东各地的翻版，只要稍一用心，便可举出许多例证。两岸岁时年节极为相似，正月初一春节、正月初九“天公生”、正月十五元宵、正月二十九拗九节、三月三上元节、四月五清明节、四月八浴佛节、五月五端午节、六月初一或十五的半年节、七月七七夕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九重阳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冬至节搓丸、腊月廿三祭灶、除夕年夜饭，以及众多民间神祇的信仰节庆日等，闽台大抵相同。民间生丧婚嫁习俗、民居建筑、饮食习惯、吉彩和禁忌乃至生产生活用具等，都极其相似。

民间信仰——台湾民间信仰也绝大多数是随福建移民迁徙而传进岛内的。台湾民间所崇拜的神祇，大部分与福建地方神有密切关系。据统计，台湾的庙宇超过 15 000 座。除了中国传统神明以外，其他都属于福建各地民间供奉的神明，诸如天上圣母、广泽尊王、观音、佛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福德正神、临水夫人等。最有影响力的天上圣母，就是根源于福建湄洲的妈祖。闽台还流传着很古老的蛇崇拜，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闽”字为“东南越蛇种”，就是说闽族是以蛇为图腾或崇拜对象的原始部落。至今在闽西还能看到“蛇王宫”“蛇腾寺”等遗址，闽东一带畲族老年妇女发髻上大多插有弯曲蛇形的“蛇簪”。闽北闽江边上的南平樟湖镇，至今保留着祭蛇的民间文化活动，以及建于明代的“蛇王庙”。漳州平和县文峰镇三平村一带人们，把蛇当作保佑家居平安的神物，尊称蛇为“侍者公”。无独有偶，台湾少数民族也有很古老的崇蛇传统，比如排湾人、鲁凯人和布农人。排湾人和鲁凯人把百步蛇作为祖灵的象征和图腾，他们的服饰很讲究，少女的围裙上都有百步蛇花纹；布农人服饰上也都有百步蛇图案，甚至以百步蛇文身，他们有高超的狩猎技能，但从不捕蛇类，不吃蛇肉。这些传统，显然与闽台先民同出一源的原始蛇图腾崇拜密切相关。

### 第三节 闽台文化的共同特质与共生活力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用生存环境的挑战和人类的应战来解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一种文明在通过人类迁徙转移到新的地方后,在新环境的挑战下,往往创造出比其在原生地带更加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当这种转移发生在两个跨海地带之间时,刺激力就更大,促进文明成长的作用也更加明显。汤因比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他所揭示的多数是跨文化现象。与这些文化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台湾海峡两岸文化是一种同质的建构,海峡并未成为文化歧异的鸿沟,而是成为强化文化联系的通道。尽管如此,从海峡两岸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来看,汤因比的文明播迁理论仍可以为我们诠释闽台文化提供一些参照。

闽台文化是汉族农业文化在南移的过程中,应对东南区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的“新环境的刺激”而形成的一种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复合型的区域文化。从一个大的范围来看,台湾海峡的确构成一种刺激区域文化成长的天然空间。福建依山面海,西北内陆多为崇山峻岭,东南则相对平缓,沿海则密布海湾和延伸入海的岛屿;与此相隔一衣带水,台湾则呈东部多山,西部平缓地势,与福建地形相呼应,形成一个以陆架相连的海峡为轴心,以沿海平地为双边平台,以山区为腹地的广袤地带。自然资源的有限和地势特点,决定了内陆农业开发完成之后必然向海上延伸。事实上,如前所述,整个区域的农业开发正是循福建内地到沿海、跨海峡进入台湾后,又循西部沿海到东部山地的序列进展。在汉族文化应对这个天然空间的“新环境的刺激”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其文化内涵特征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不断强化的与内地文化的联系。汉族文化向东南区域的传播,不是在一次大迁徙中完成的,而是陆续地、逐波地进行,进入福建和进入台湾都是如此。这种历时性的传播,使得新地方的文化与其原生地带不是产生疏离的关系,而是

不断强化的关系,也就是所谓“内地化”效应。人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移居福建,还是移居台湾,汉族农业社会的基层结构及其文化都是与内地高度一致的;移民的过程,实际上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不断扩展、复制的过程。因此,从文化的主体内涵来讲,闽台文化并没有流失大陆农业文化的主要特质,中原汉族文化在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起着基础和主导的作用。

二是海峡地带在这个相对成形的天然空间中的辐辏效应。因地势的关系,福建境内的主要河流都由西、北往东、南流入台湾海峡,而台湾的河流则大都由东往西流入海峡。这些河流是农业社会导引资源流通的重要载体,加上两岸互相延伸的诸多岛屿,台湾海峡遂成为聚合两岸资源和通向外界的天然通道。这是孕育海洋文化的自然条件。事实上,宋元以后,在阿拉伯商业文化和西方殖民者带来的海商文化的影响下,台湾海峡在聚合整个东南区域资源和解构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滨海地带的经济文化迅速崛起,并且不断萌发向外开拓的冲动,这是传统农业社会应对“新环境的刺激”而进化的新的文化基因,也是闽台文化的重要特征所在。

由于山区腹地复杂地理条件的限制和海洋活动的不稳定性,海峡的聚合纵深并不是无远弗届;同时,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相对静态的根性,并不是所有的山区都能主动回应海峡的聚合。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海峡环境所激发出来的新的文化基因,在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就整个东南区域的发展进程来看,最活跃、最能反映区域历史发展趋向的,无疑是这种新的文化基因的成长。从明清到近代,闽东南沿海和台湾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区域行政建置的一体性,个别地带的发展足以带动腹地农业和手工业商品化的发展,促进全区域的物品流通,也拓展了“转货四方,罢师估人高帆健橹,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滔风浪中”<sup>①</sup>,向海外寻求生计的渠道。因此,总体而言,对于闽台区域文化的共同特质,我们还是可以用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

进取性。东南区域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原的移民,冒险犯难是移民最

<sup>①</sup> 《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页。



突出的生存体验，因此闽台居民多有开拓进取的传统品格。古代移民入闽后，先是开发闽西北山区，然后向沿海平原开拓，然后再向台湾发展，其间经过一再的移民经历，加上西方海洋商业文化的影响，其冒险犯难和开拓进取的品格不断得到强化。因此我们看到，越是接近沿海地带，进取性越强，闽南人、台湾人的这种品格表现得最为突出。

务实性。移民面临的是生存考验，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必须抛弃幻想，少说空话，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实利、实用、实效；福建山多田少，资源有限，南宋以后即呈人口过剩局面，民生问题始终突出，这种状况也迫使人们更多地考虑日常生活问题。因此，闽人质胜于文，“其君子无仕不仕，无造次辨丽之智，盘辟鞠躬而重为邪；小人帖帖愿谨，自取衣食而已……”<sup>①</sup>。清朝有个游宦台湾十余年的官员翟灏，曾感叹台湾漳、泉籍民的所谓“义举”，都是“有所为而为”而非“为其所当为”<sup>②</sup>，这也是台湾人凡事求功利的典型性格表现。

恋根性。闽台人走南闯北，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改变对乡土的认同和对故园的怀念，叶落归根，寻宗谒祖，衣锦还乡，造福桑梓的意识很强，对本土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曾多次出现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闽人在学界者不少，但很少见闽人有极端否定传统文化者，相反，却有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等文化名人，大量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化。日本对台湾实行50年的殖民“同化”政策，也未能改变台湾人的固有文化传统。

包容性。东南区域远离传统政治文化中心，与“方外”文化接触较多，汉族文化说到底也是一种融合性文化，因此该区域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闽越之间，岛夷斯杂”<sup>③</sup>，“麇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sup>④</sup>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其中闽南和台湾的多元文化表现尤为突出，除了主体的汉文化，中亚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东洋文化和台湾少数民族文化，无不具有宽松的生存空

① 何乔远：《闽书》第1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2页。

② 翟灏：《台阳笔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印行，第17页。

③ 李日方等编：《文苑英华》第3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328页。

④ 郑侠：《西塘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间；而通过华侨外移的本土文化，也都能与当地文化平和相处。

以上述共同特质为基础，闽台文化曾经在以下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共生活力。

一是科技方面引进和创新的能力。如前所述，东南区域开发的历次浪潮，都是在汉族农业文化的影响下推进的，其中，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创新起了关键的作用。在第一波浪潮中最富有革命性意义的技术进步，是汉族农耕技术和铁器的引进和运用。第二波浪潮中的技术进步更加全面，水利、围垦技术的改进，新式灌溉工具、轻便农具的发明，粮食品种的改良，耕作制的改进，经济作物的推广，等等，使农业精耕细作得以实现，并带来社会文化全盛的局面。第三波浪潮则得益于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受郑和下西洋的刺激，福建造船、航海技术取得新的发展。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漳州月港的兴起，闽南沿海造船业非常发达，民间便能私造“高大如楼，可容百人”的大船，“扬帆外国，交易射利”<sup>①</sup>。这些技术进步，使趋于饱和状态的福建农业经济，获得了新的增长空间；加上初来乍到的殖民者带来的西方海洋文化的影响，海上活动的技术条件更加完备。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台湾的开发才成为可能。而到了近代，以洋务运动为契机，福建很快取得科技优势，并迅即影响台湾，借重于福建船政局的有利资源，台湾很快实现了近代化的起步。

二是促进文化与经济二者互动的能力。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的地区显然占有优势，因此我们看到，素有福建“粮仓”之称的闽北地区，在宋代农业的大发展中成为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与此相适应，闽北地区也成为整个东南区域的文化渊薮。农产品的富足滋养了大批脱产文化人，才有了孕育朱子理学的社会条件。而理学和教育事业的发达，不但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开发，而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勃兴，使闽北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印刷出版中心，造纸、矿冶等手工业也闻名遐迩。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全省经济重心转移到闽南，随即文化重心也跟着南移。明朝前期，闽南地区的文化还相对落后，明朝中期以后，泉、漳科举人数迅速增加，很快超过文化名郡建宁、兴化，后期

---

① 《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3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